

河海天

区位优势与城市得名

吴裕成



(清)潞河督运图(局部)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历史上,天津城最重北城门,东门次之。清代北门颜额“带河”,东门挂匾“镇海”,张扬这一方水土形胜之妙——襟海带河。河海通津的区位优势,助力津城的崛起与发展,也塑造城市的文化性格。对此,本文且以天津城市得名缘由的视角,略述一二。

在地理特点方面,津沽为退海之地。康乾时期,津人又朴《诗礼堂杂录》记:“父老相传,海即在直沽之下,今且东去一百余里矣。而余亦往往于海之西北各乡村,如泥沽葛沽见掘地得蛤蜊无算。则地渐运而西,水渐运而东,可为明验也。”表述海退陆进、沧桑演变,“渐运”一词甚为传神。参与成陆,有携泥沙而来的黄河。渤海西岸至少四道年代不同的贝壳堤,留下一道道古海岸遗迹。称谓此地貌,津人有用“堦”字。堦音横,去声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词条:“用于地名:大堦上|东堦(都在天津)。”词条的括号加注,特作提示。清乾隆年间救灾排涝,导水分流,经中堂注入海,地方志记注内土堦如堤,“多年海蛤积聚而成,其坚如石,非开凿土堦水不能过”。贝壳堤,民间习称“蛤蜊堤”。当代学界关于贝壳堤的考察研究,上世纪50年代由天津学者李世瑜首先开展。

退海之地,河网泛滥众多,便有“七十二沽”之说。其名目,清同治年续修县志曾逐一开列。泥沽葛沽丁字沽,塘沽汉沽咸水沽,“沽”成系列,还与“直”结伴,与“津”暨合,“统领”这方热土的地名文化。

地处渤海之滨,又拥有诸水汇流的出海口,所谓“九河下梢”包括运河,众水合一,扇面般的图形,成了海河流域的形象概括。“下梢”与“九河”,以舟楫航运,是海港与腹地的关系,也是传递城市辐射力的天然渠道。旧时,白洋淀水畔的郑州药王庙会规模较大,民谣夸耀过大世,“上过节,下过节,赶上郑州药王会”,可见那时河北人眼里的“京津冀”。所言“上”“下”无贵贱之分。一句“下天津”,乘船顺流而下,自有“轻舟已过”,奔趋繁华街市之爽。明朝所设军卫不少,“下卫”却能指向明确,还有“卫流”称谓的各种事物,天津城把“卫”字叫响,凭着自身在发展中获得的魅力,也得益于“九河下梢”。当年皇会盛况,可为直观例证。光绪年间《津门杂记》载:“香船之赴庙烧香者,不远数百里而来,由御河起,沿至北河、海河,帆船林立。如芥园、湾子、茶店口、院門口、三岔河口,所有可以泊船之处,几于无隙可寻。河面黄旗飞舞空中,俱写‘天后进香’字样。红颜白鬓,迷漫于途。”“下梢”与“九河”之间的交通,自然不仅仅是实现了大众文化狂欢的共享。

津地河流,更得说运河。自然造化,加以人工,三国时代曹操为北伐乌桓,利用原有河道,开辟了平虏渠、泉州渠、新河三条运渠。其中平虏渠,大体相当于今南运

河从河北省青县至天津静海区独流镇之间的一段,沟通了滹沱河和泃河,清河也就可以沿泃河再向北与沽水相会。华北平原上三百多条大小河流组成的清河、滹沱河、泃河,三大河流汇合入海,初步形成扇形水系。

宋、金对峙时期,金朝立中都城于燕京(今北京)。自古不绝的水道运粮,至此与天津河道的关联更显著。隋炀帝开凿永济渠(即大运河北段),本是经过霸州的。金泰和五年(1205),那里河道浅涩行船难。金章宗改凿运河,河道至独流时不再西转,而是经三岔河口,北达通州。转年,为保障漕河运输,规定沿河县官加带“管勾漕河事”职衔——有如“河长制”。所列一串地名,靖海(今静海)和武清均在列。贞祐二年(1214),“直沽”名称在《金史》出现了,以完颜佐为都统,完颜咬住副之,“戍直沽寨”。完颜佐“初为武清县巡按”,完颜咬住“为柳口镇巡按”。武清守着由燕京北来的河,柳口(后来称杨柳青)守着由南向北的河,两处的巡按一正一副“戍直沽寨”,来守河运枢纽。都统拥有五千兵员,可见直沽寨的规模。直沽寨应是走向城市的最初萌芽。这被深深印在城市记忆里。如今古文化街南口北口,“津”“故里”“沽上艺苑”两座牌坊相呼应。

元朝的建立,扩大了漕运规模。《元史·食货志一》记,“元都于燕,去江南极远,而百司庶府之繁,卫士编民之众,无不仰给于江南。”漕粮运输,尝试陆河联运三条线路之后,不得已将目光投向海运,由江浙航海至大沽口,再走河道至燕京。海路也经过三次探索。先试近岸航路,再改为不一味地“沿山求屿”,乃至后来的更加远岸,赶上“风信有时,自浙西至京师,不过旬日”,

《元史》接着写道:“然风涛不测,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,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。”并不掩饰海浪险恶。“杂沓东入海,归来几人在?”这首元代歌谣,表达视海路为畏途,也写到“复祷天妃上经船”。航海者心理压力的疏解,靠帆船造得能经风浪,靠驾船技能,也靠崇信海神的心理慰藉。这便是妈祖文化北传的背景。

元朝崇奉“加封天妃神号,积至十字”,为“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”,“庙曰灵慈”——津地大直沽天妃宫匾额正是“灵慈”。《元史·祭祀志》还记,“直沽、平江、周泾、泉、福、兴化等处皆有庙。皇庆以来,岁遣使香遍祭。岁岁举行官祭的六个地方,北方唯有直沽。这六地,“泉、福、兴化”,妈祖文化发祥地福建占三,而平江、周泾之于直沽,则是海漕一线系两端。“海漕粮至直沽,遣使祀海神天妃”,妈祖文化的北来,直沽不只是接受方,也是文化互动传播的参与者。直沽致祭,敕建的天妃宫——这里一地两座,全国仅例,河之东岸、西岸各一。信众是被海河联运枢纽聚拢的南方人与北方人。妈祖文化成为天津城市端倪时期的原点文化,经明朝传承,至清代天后娘娘被奉为“三津福主”、民俗打卡,广泛地影响了津地文化。如今旅游热门打卡地——津味醇厚的古文化街,即海河西岸天后宫的宫南、官北大街。

元朝时,翰林学士张翥有诗曰,“晓日三叉口,连樯集万艘”,又有诗曰“一日粮船到直沽,吴艚越布满街衢”,可见海联运带来的活力。且不止这些。明代创修三卫志的天津道官员胡文璧曾概括:“元统四海,东南贡赋集刘家港,由海道上直沽,达燕都。舟车伕会,聚落始繁,有

官观,有接运厅,有临清万户府,皆在大直沽。”聚落繁,官衙立,不妨视为对城市起步的驱动。盐的产销也来助力。据地方志所载《三汉沽创立盐场碑记》,得益于“河路通便,商贩憧憧往来,是年办得课五百余锭,比之他场几倍之”。元代诗人傅若金《直沽口》选取典型场景,有句“使收通漕米,兵捕入京盐”,漕运与盐业并举,均得于区位优势河与海。

水到渠成,元延祐三年(1316)春,“改直沽为海津镇”,寨升镇,为明代设卫建城做铺垫。镇称海津,意谓通海之津,既讲海也说河,质朴写实地总结了元王朝的直沽认知。值得一提的,是,得于明代的城名“天津”,海津镇之“津”先期占了“半壁江山”。有预见而“抢注”?自然不是。津城命名借鉴了前朝?没有可助直接认定的史料。然而,关于区位优势的认识,元明两代“英雄所见略同”,这样讲大约经得起推敲吧。

永乐二年(1404),明成祖朱棣决策设天津卫并筑城。据《明太宗实录》所载,朱棣“以直沽海运河商舶往来之冲,宜设军卫,且海口田土膏腴,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”。海运商舶往来之冲,说海船其实也说到河;列出的缘由,水陆兼及——关于陆,偏偏关注的是“海口田土”,要调动原本沿海驻守的军卫来屯守海口。何谓海口,不就是河与海的连接吗?南粮北运,明初因循元代走海路,此时依旧;与洪武年间不同的是,燕王朱棣兴“靖难之役”,打从侄子手中夺得天下的那天起,即在运筹迁都北京。京畿门户、河海通津,区位优势决定明朝在这里布置三个军卫、筑造一座城。主持修建城池的官员,一为工部尚书黄福,一为平江伯,海运粮信总兵官陈瑄。建城的同时,陈瑄还在津做了两件事:沿河建仓囤,以便海船漕粮的内河转运;重修天妃宫,服务河海航行。

天津之名,取意天子渡河的地方,由朱棣命名。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,是建城之后90年,弘治年间首任天津道刘福兴土木,朝臣程敏政为涌泉寺撰文,大学士李东阳为城墙城门写记,言及朱棣“入靖内难,自小直沽渡河而南,名其地曰天津”筑城浚池,立为今名,则象车驾所渡处”。现存的碑石,有嘉靖年间《重修天津三官庙记》,碑文“圣驾由此济渡沧州,因赐名曰天津”。都是讲,直沽河流与明初一次重大军事政治事件的关联及对胜利的纪念,被收入这一名库里。

清代人承接这份地名遗产,康熙时修卫志不仅载“文皇渡此,赐名曰天津”,还写有纪念牌坊——飞龙渡津坊,在北门外运河畔。乾隆初年修县志,飞龙渡津坊坊依旧立着。可是,这部志书卷首凡例列出“天津之名,《金史》第以河传”,序文提及“津邑特肇端于卫,卫则肇端于海津镇”,正文又引述朱棣的重要谋士姚广孝所谓“天津九星,占小直沽,以此得名”,似乎在为“赐名说”做补充——这些材料提示,“天津”之名浓缩了河海通津、金元明三代漕运史,“天津九星”云云,则是借用古典天文学的传说,夸耀大地上的河流,称赞其为通京水道、畿辅咽喉。

帝王命名,对于城市文化不是减分的事。可是,既然存在诸多相关文史话题,也没必要视而不见,拒绝相加。“天津”名称的底蘊,与“直沽”“海津”一脉相承,包含着古代对河海通津区位优势的认识,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,作如是观,或许优于将这一地名的来源单一化。“朝发初于天津兮”,这是先秦诗人屈原吟咏星空银河的名句。星海天河,海风河韵,天津是座拥有嘉名的城市。这嘉名,浓缩着京畿门户、河海通津,关于区位优势的表达。

(作者系《今晚报》高级编辑,曾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委员、《天津文史》特约编)

言必碎碎念 啰哩又啰嗦

王吴军

明朝初年,江南有一读书人赴京应考,他一到京城,就急忙给妻子写了一封信,这封信写了十几页,其中有这样一段:

此次南来,南京城新建城楼一个,城楼四角挂铃铛,风吹铃铛,叮叮当当,与我们家门楼大不一样。此次南来,归期未定。不在初一就在初二,不在初二就在初三,不在初三就在初四……不在二十七就在二十八,不在二十八就在二十九,为什么不写三十,恐有月大月小之分。

此次南来,忘却一事,床下有棉鞋一双。若遇天晴之日,拿出来晒晒,拍拍打打、打打拍拍,以备天寒之用。

此次南来,如若考中,我妻改为夫人,大小子改为大公子,二小子改为二公子,三小子改为三公子,余此类推。

此次南来,如若不中,我妻仍为我妻,大小子仍为大公子,二小子仍为二公子,三小子仍为三公子,余不赘叙。

此次南来,有一事放心不下,二小妹容貌尚好,对面王二麻子大有不良之意,要嘱咐二小妹少在门口张望,千千万万,万万千。因时间关系来不及写草头的万言万字,就以方字去掉一点以代之,而代与伐不同,有有撇无撇之分。

往日写信啰嗦,今日不再啰嗦,啰哩又啰嗦,啰哩又啰嗦,实在可恶……

这封信写了多少废话,看过这一段的人自然能想象出来。

北宋时期,江南有一个读书人为一个和尚写了一首诗:“一个孤僧独自归,关门闭户掩柴扉。半夜三更子时分,杜鹃啼血子规啼。”这首诗可谓废话连篇。无独有偶,《古今谭概》里有一首《咏老儒》,诗曰:“秀才学伯是生员,好睡贪食只爱眠。浅陋荒疏无学术,龙钟衰朽驻高年。”这首诗也是极其啰嗦。

有人杜撰了一则讽刺爱啰嗦者的笑话:有一天,朱熹去拜见老师,正好老师外出,朱熹就留下了一张纸条:“门人朱熹拜拜。朱者姓也,熹者名也,门人者学生也,百拜者此词顿首也。”老师回来后,看到这张废话连篇的纸条,很不高兴,就在纸条上面写了两个字:“啰嗦!”第二天,朱熹又来拜见老师,老师又外出了。朱熹看到自己昨天留下的纸条上有老师的批语,就在老师的批语旁写道:“啰嗦者繁复也。”老师回来一看,十分生气,又提笔写道:“太啰嗦!”第三天,朱熹又来拜见老师,老师又外出了,朱熹又在老师的“太啰嗦”旁边写道:“太者更进一层也。”“啰嗦”见前注。”写罢,朱熹得意地想,“见前注”言简意赅,这下总不能再说我“啰嗦”了吧。

要言不烦 生动传神

王兆贵

话说春秋中期,晋、楚两国在今河南荥阳附近会战,史称“郟之战”。在这场激战中,晋军由于将帅失和、指挥失调,以致溃不成军,上中下三军折其二,仅上军未败。

据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记载,晋军逃跑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: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,楚人甚之脱局,少进,马还,又甚之拔旆逐,乃出。顾曰:“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。”

楚,在这里是指启发或点拨。译为白话,大意是说,晋军因战车簇拥在一起而跑不快,楚国士兵见状,在后边喊道,车前的横木太碍事了,赶紧抽掉啊!没走多远,晋军的马在原地打转,不肯前进,楚国的士兵又喊道,车上的旌子太碍事了,赶紧拔掉啊!就这样,在楚人的指点下,晋军最终成功脱逃。突围后,晋国一位士兵回头调侃说,我们不如某大国逃跑的经验丰富啊。言外之意是,楚军经常吃败仗,所以才那么熟悉撤退的招数。

《左传》记述的这一场景,简练之至,风趣之至,原文不到五十字,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刀光剑影的战场上,还有如此戏剧性的一幕。晋国士兵调侃后不忘反讽的调皮神态,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换作今天,足以制作成系列动漫及表情包。

莞尔的同时,让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古人精练而又传神的表达艺术。须知,《左传》成书的年代,距今已逾两千五百年,史学大家左丘明不愧为“百家文字之宗、万世古文之祖”。一部《左传》,共约18万字,涵盖了春秋两个多世纪的历史,为我们留下的成语多达四百多条,仅商务印书馆编写的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就收录了二百多条。常用的如,东道主、执牛耳、止戈为武、宾至如归、从善如流、言归于好、除旧布新、居安思危、有备无患、举棋不定、唇亡齿寒、筌蹄蓝缕、厉兵秣马、一鼓作气、多行不义必自毙、风马牛不相及等,都能在《左传》看到原话。

反观有些文章,动辄假大空,言必碎碎念,“连篇累牍,不出月露之形;积案盈箱,唯是风云之状”,即便是妙语迭出,究其实毫无营养,又有谁会喜欢呢?

冯梦龙与其文学作品

张家康

的人群中采集讯息,编纂了一部《甲申纪事》,并撰写了《甲申纪闻》《绅志略》等卷,慨叹王朝更迭,谴责文官腐败,痛斥武将无能。

明末,以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为代表的“公安派”文人,反对模仿古人,提出“独抒性灵”的创作口号,主张文学作品要有创造性和真实感,重视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创作和收集。冯梦龙认同这样的文学主张,特别是在收集编写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,他是一个积极的践行者。

冯梦龙说,好的小说可以使“怯者勇,淫者贞,薄者敦,顽钝者汗下。虽小说《孝经》《论语》,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”“三言”之所以题名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,起的就是劝人为善的社会教育作用,即“明者,取其可以导愚也;通者,取其可以适俗也;恒则习之而不厌,传之而可久”,意在劝喻、警戒和唤醒世人。

“三言”风行海内外

今天谁都明白“说话”是用语言表达意思、发表见解,唐宋时“说话”却是一门艺术,简而言之,就是说话讲故事,从事“说话”的艺人被称作“说话人”。这种艺术流行于勾栏瓦舍,深受民众喜爱。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,被称为“话本”。模拟“话本”创作的作品,被称为“拟话本”。它的出现,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,逐渐脱离了口头创作阶段,成为作家的书写文学。

冯梦龙收藏了很多宋、元、明的话本,在书商的推动下,精心选出四十篇,进行编辑润饰,出版了一部《古今小说》。因社会和市场反应很好,他又选出八十篇,再编辑了两部。这三部著作分别以“喻世明言”“警世通言”“醒世恒言”题以书名,每部四十篇,共计一百二十篇,约一百五十万字。《喻世明言》大约出版于明天启元年(1621),《警世通言》出版于明天启四年,《醒世恒言》出版于明天启七年。

“三言”所描述的故事,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有男女爱情,有行侠仗义,有官绅僧道,有诉讼勘案,有神灵怪异,有文人雅士等。明末社会的阶层差异、生活风貌,都在书中一一呈现。

“三言”中最多的男女爱情故事,几乎占了三分之一。写得尤为出色的爱情故事是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《宋小官团圆破毡笠》《玉堂春落难逢夫》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《钱秀才错结凤凰缘》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》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等。

“三言”中一些作品,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卑鄙、刻毒、贪婪、淫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,如《木绵庵郑虎臣报冤》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》《隋炀帝逸游召谴》等。

“三言”中还有一些作品,是有关信义、任侠和神灵怪异的故事,最出色的是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。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,自有那个时代的印记,其中也有宣扬封建思想、礼教和制度,宣扬荒诞迷信等内容。

冯梦龙以现实主义为基础,以通俗白话为表述手段,用生花之笔编写出的这些故事,情节跌宕起伏,人物丰满生动,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诵,历四百年一版再版,从未中断。

“三言”还走向了世界。十八世纪时,“三言”中的许多作品被译成日文,同时也被传到欧洲。德国著名诗人席勒在读了《今古奇观》(以“三言”为主的选本)后,写信告诉歌德:“对一个作家而言……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,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。”

到了现代,“三言”中的许多作品,如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《十五贯戏言成祸祸》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《玉堂春落难逢夫》等,被改编成电影、戏曲、电视剧等。“三言”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宝库,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一生著作等身

明代文学家卓人月说:“我明诗让唐,词让宋,曲让元,庶几《吴歌》《挂枝儿》《罗江怨》《打枣竿》《银钗丝》之类,为我明一绝耳。”《吴歌》

《挂枝儿》《罗江怨》《打枣竿》《银钗丝》都是民歌,在明代民歌可算一绝。“不问南北,不问男女,不问老幼良贱,人人习之,亦人人喜听之”,如现代的流行歌曲,风行一时。

《挂枝儿》是明万历年间流行于大江南北的民歌小曲。冯梦龙的收集有一定的标准,那就是“情真”,它所抒发的都是缠绵苦恋、思盼佳期的情怀,读之可感受到率真、火一样的真情,浓厚的乡风民俗扑面而来。如其中一首《送别》:“送情人,直送到丹阳。你也哭,我也哭,赶脚的也来哭。赶脚的,你哭是因何故?道是去的不肯去,哭的只管哭。你两下里调情也,我的驴子受了苦。”

这样构思奇妙的作品,在民歌集《挂枝儿》中几乎篇篇皆是。奇文奇情,诙谐风趣,读罢令人忍俊不禁,难怪此书一出版,即盛传市面,如明代文学家沈德符所说:“举世传诵,沁人心脾。”

民歌集《挂枝儿》又名《童痴一弄》,十卷,原书久已失传。新中国成立后,分别在上海、杭州发现刊本和抄本,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出版,共四百三十五首。

民歌集《山歌》又名《童痴二弄》,十卷,原书也久已失传,1934年发现后排印出版。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出版,共三百八十三首。

冯梦龙在《情史·序》中说:“我欲立情教,教诲诸众生。”这是他编《情史》的初衷,旨在同情、赞美那些纯洁、忠贞的爱情,鞭挞那些肮脏、丑恶的情欲。

《情史》和“三言”的整理和创作密切相关,“三言”中有二十多篇的作品素材取自《情史》,如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《金令史婢酬童童》等。

除《情史》外,冯梦龙还编纂了《古今谭概》《智囊》《笑府》等。《古今谭概》是部内容丰富、文笔犀利的讽刺小品集。《智囊》是从历史文献、稗官野史中摘录下来的短文,是古人运用聪明智慧排解困难的故事。《笑府》是民间笑话的汇编,内容多是讽刺贪官污吏、地主奸商和市井腐儒,同时也嘲讽不知以为知、庸人自扰、健忘、嗜酒、唠叨、吹牛等行为。

除了上述著作外,冯梦龙还修订和创作了十四种传奇,传奇就是戏曲。他的修订主要是调整思想内容和情节结构,自然也包括曲调、音韵、平仄等方面。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经他修订后,很为业内行家称道。《牡丹亭》中《春香闹学》《游园惊梦》《拾画叫画》的舞台演出本,就是冯梦龙的修订本。